

明朝廉州海上丝绸之路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兴衰

■ 李志俭

明朝前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郑和七下西洋证明中国航海技术占据世界领先地位。贸易、漕盐、采珠是明代廉州府重要海洋经济项目。明初廉州仍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重要口岸。然而，明王朝后期实行“海禁”政策，不但使中国落伍，而且造成地方经济衰落。因而，我们研究探讨明代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衰，总结经验教训，对于我们深入改革开放，具有重要参考作用。

一、明朝实行“富民强国”和“示富耀兵”政策，廉州成为明代中国“海上丝绸之路”重要口岸

洪武元年（1368年）五月，明太祖朱元璋即帝位后，派遣征南将军廖永忠等人率兵占领廉州，“诏减官田税额，改廉州路为府”。明朝廉州府辖境包括今广西沿海的北钦防三市。据《广东通志》（嘉靖）卷一记载：由于廉州经济文化恢复发展，加上地理位置优越，“扼塞海北，远镇交南，凿山为城，践海为池”，因而成为明朝在岭南的重镇。当时冠头岭下的南湾港（古称“南湾”，今北海港区水域内），已成为贾舶渔船云集之地。洪武八年（1375年）商民在此地建成“镇海庙”，为商贾和渔民出海前求神保佑之所。当时，明朝派兵驻守冠头岭，并建“廉阳古洞”（又名龙王岩），明初冠头岭一带水域便成为合浦主要港口。冠头岭在合浦城南八十里，“穹窿如冠，西南临海，南北皆粤海船舫焉，潮长撼石如雷，相传交趾黎王葬此，交趾人每岁望海祭之”。这段史载说明两个问题：第一，明朝时冠头岭海域已成为广东海舶主要寄碇之所，并成为廉州的主要门户。其中，冠头岭的南面和北面海域，即今北海港石步岭港区、装卸锚地、外沙内港、高德港、南湾港、侨港等处。第二，相传交趾黎王抵中国贸易回国途中，因病去世葬在冠头岭上。从中可以反映出明朝嘉靖以前，冠头岭海域已是中国对外贸易重要门户。明代刘子麒《冠头秋霁》诗云：“屹岩壁立镇惊涛，独战商炎爽气高。多少艨艟冲巨浪，凭虚一览尽秋毫。”明代汤显祖《阳江避热入海，至涠洲，夜看珠池作，寄郭廉州》诗中云：“日射涠洲郭，风斜别岛洋。交池悬宝藏，长夜发珠光。”从明代文人墨客对冠头岭和涠洲岛海景的描写，可以反映出明代廉州海洋经济的繁荣。

明初，朱元璋下令农民归耕，减轻徭役和赋税，“富民”政策客观上对廉州经济文化的恢复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廉州沿海地处亚热带，气候“少寒多热”，雨量充沛，因而物产丰富，种类繁多。同时，明朝廉州府又以鱼盐为垄断，每年“盐课七万二千四百七十六引”，相当于漕盐3000余万斤，盐产量高于前代。此外，廉州沿海还盛产海味，以及闻名中外的珍珠。明朝廉州经济文化的发展，为港口对外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出口物资。明代廉州府治（今廉州镇）设有阜民圩、西门市、卫民圩等易货市场。其中，阜民圩、西门市靠近西门江（南流江的支流）而设，拥有河道航运出海口的便利，成为南流江下游的主要货物集散地。明代饶秉鉴《阜市人烟》诗云：“阜市东来接海滨，市中烟火起楼台。几家竣宇相高下，无数征商自往来。民俗喜从今日厚，柴门应为故人开。圣朝自是多丰乐，常听欢声动六街。”从文人学士对廉州商市的描写，可以反映出明代廉州一度歌舞升平，经济文化繁荣兴旺。

随着经济文化的复苏和繁荣，明初朱元璋十分重视国家的强大和威望，“遣使颁科举，诏于安

南占城，以其通中国文字也。诸番莫不畏威怀德，自是朝贡不绝”。当时安南、占城、真腊、暹罗、满刺加、三佛齐等东南亚国家的使者和商人，由海道来中国，常进贡方物。公元1369年，安南、占城使者奉表来朝，进贡方物，并请封爵。朱元璋分别封陈日烺为安南国王，阿荃阿者为占城国王，并赠金印、《大统历》等物品，向东南亚国家传播中华文化，密切双方的人文交流。同时，与安南、占城等国建立藩属关系。洪武四年（1371年），占城向明朝朝贡，“使者皆带行商”。明朝既如意招徕，海外各国商人自然乐于与中国通商。廉州自宋朝辟为与交趾互市之地，一直是中国对东南亚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口岸。正如《广东通志》（嘉靖）卷六十六记载：“高雷廉海面，惟廉州接近安南占城为重地焉……”由此说明当时廉州因地理位置重要，而成为明朝与安南、占城两国经济文化来往的主要通道。同时，经廉州与明朝通商的还有暹罗（泰国）等国。洪武初，其国王遣使朝贡。“北直廉州，循海北岸”。海北岸，即今广西北部湾沿岸一带。反映出明朝泰国等东南亚国家来中国，亦取道廉州登陆。随着官方贸易的发展，廉州与东南亚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来往更密切。

朝贡贸易是明朝“海上丝绸之路”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一种主要形式。安南、占城、暹罗等国家经廉州“朝贡”，就是以朝贡为名行贸易之实。表面上承认自己是“附属国”，实际上是通过“朝贡”这一形式与中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从中赚取经济利益。明初，廉州亦是安南、占城朝贡的必经之路，南流江仍是中原出北部湾旁通东南亚的“黄金水道”。据《钦州志》（嘉靖）和《文献通考》记载，“安南入贡所过州县，差夫众多，自静江水路可至容州”，又经北流至郁林，“自郁林州水路可至廉州，皆有回程盐船、运盐牛车可雇，自廉航海一日之程即交趾”。由此可见，明朝廉州是安南“朝贡”必经之道。所以，明太祖朱元璋很重视广西内河航运和廉州对外贸易，曾主张在汉朝马援修凿的桂门关，开凿南流江、北流河之间的运河。又据《国榷》记述，“洪武二十七年十二月辛未，凿广西玉林北流南流二江”。商贾由港口乘船溯江而上，便可通向广西各水道。这是明代广西发展内河航运和海上运输的极重要措施。嘉靖年间，北湾（今北海港海域）、南湾的海面上“皆粤海船”。明朝初期十分重视海外经济文化交流，据《廉州府志》（嘉靖）卷四记载，廉州海上通占城、暹罗、真腊、爪哇、满刺加、三佛齐、渤泥、天方西洋等国，并建立不定期航线，使廉州对外海上运输，更是畅通无阻。由此证明，明朝中期以前廉州仍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口岸。

明朝中期前，明王朝不但注重发展经济和海上贸易，而且以军事实力作保障，维持中国边境的和平安定。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安南黎氏篡夺陈氏家族王位后，侵占明朝广西思明府所管辖的禄州一带，同时，又侵略占城，与明朝关系恶化，双方经济文化交流一度中断。此后，安南海寇与倭寇开始在廉州沿海进行武装掠夺和骚扰，甚至在港口抢劫中国商船，焚毁沿岸村庄。因而，港口海上交通和贸易大受影响。同年七月，明朝廷为了加强海防，“命廉州备倭”，并且派大员抵廉州，“教习训练沿海寨所军官”。当时，明朝在廉州府合浦县沿海设珠场等八寨，并在乾体、白龙设水师驻防，还在冠头岭增兵屯卫。据《合浦县志·事纪》记载，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廉州府衙门奉命发布檄文“禁通番”，一改前段时间的开放政策，实行严格的“海禁”，“无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明太祖实录》）。同时，明朝还派水军在今广西北部湾海面巡逻警戒，严防安南的侵扰。永乐三年（1405年），安南不但侵掠廉州沿海，而

且侵占占城领土。占城使者向明朝进贡回国，途中又遭安南掠劫。据《明史》记载，安南十分嚣张，“逐侵广东雷琼，盗珠池”。珠池在合浦县沿海，安南黎氏集团派水军在此大肆抢劫商船和珍珠等宝货。安南陈氏集团陪臣来华告急，揭露黎氏集团弑主篡位，残害忠良，请求明朝兴问罪之师。明成祖朱棣闻讯大怒，由今广西、广东、云南三路出兵。其中一路军，经今廉州湾取道直趋安南。明王朝以廉州作为军事基地，“仍自南流江、北流江二江运粮”，集结军队，出兵大败安南黎氏集团。公元1407年5月，安南北江、安越等地百姓纷纷到明朝军营报告：陈氏子孙，已被黎氏集团杀尽，没有后裔可继承王位，愿意恢复古代的郡县制。同年8月，明朝廷下令改安南为交趾，设置三司。从此，交趾再次归入中国版图，成为明朝的郡县。廉州与交趾之间的贸易来往，又变成国内通商。据《大越史记全书》卷一记载，永乐四年（1406年）明成祖朱棣派监生唐义到交趾，颁赐四书五经，将中国儒家文化源源不断输入交趾。儒学传入后，对其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曾起过积极作用。

明王朝早期实行“示富耀兵”的对外政策，促进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六年（1431年），明成祖朱棣重视“海上丝绸之路”的开发和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派郑和七次奉诏出使西洋，执行“示富耀兵”“怀柔远人”的外交使命。廉州与交趾、占城相邻，郑和七下西洋的第一站是占城。每一次航海，郑和船队都在占城国新州港（今越南平定省的归仁）或灵山港（今越南富安省绥和）停泊。郑和到达占城，将带去的金银、绸缎、瓷器等同当地商人进行交换，并赠送金织、文绮、彩绢、书籍等礼品给国王，邀请他派使臣来中国。后来，占城国王占巴派使臣来中国及贡方物，明王朝厚赠金印及黄金百两、白金五百两、锦绮纱罗五十匹、彩绢百匹以及有关中国礼仪、医药、历法的书籍。此后，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更加密切。占城位于今越南中部，与廉州海上交通和贸易来往十分密切。郑和七下西洋，大大提高了明王朝在国外的威望。安南、占城、暹罗、真腊等国家的商人纷纷抵廉州，与我国进行贸易。明朝大批商人亦从廉州抵东南亚进行贸易。永乐、宣德年间，为增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和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明朝复设福建、广东、浙江三处市舶司，并增设“交趾云屯市舶提举司，接西南诸国朝贡”。据《廉州府志》记载：“云屯镇在交趾新安府县之云屯岩内，海中番贾舟船多聚于此，永乐中设市舶提举司。”由廉州出海，“自海面西行三百里至鸡唱入云屯镇”。从中反映出明代廉州与交趾的海上交通和经济文化往来甚为便捷。永乐时，“入海贡舶至”，由地方官查验后，奏报朝廷，才能启运。廉州与云屯海道相通，乘海船抵云屯镇的外国使者向明皇朝贡，仍经今廉州登陆。永乐十四年（1416年）五月，由于来往廉州的外国使者和商贾甚多，加上本国大官巨贾亦抵廉州从事海外贸易，明朝廷便下诏“增设廉属驿站”。在廉州府所属区域增置水路驿站，进一步促进了廉州海路交通的发展。正如《廉州府志》记载：“所置驿站，以便往来，开中积盐，使商贾输粟，以广军储。”明代廉州驿站是番货转运、交易的场所。水路交通方便，对港口进出口货物甚为便利。

公元1427年，明朝派李彬任交趾总兵官，太监马骥为监军，兼采办珍珠。马骥十分贪婪残暴，大肆搜刮珠宝，引起当地人民的愤恨和反抗。明朝大军刚撤退，交趾清化府的巡检司官员黎利趁机组织起义军，打败明军余部，进逼东关（河内），自立为王。黎利夺权即位后，派遣使臣到明朝，贡献黄金金器及方物，请求册封，并表示“永为藩臣，常奉职贡”。后来，明王朝遣使封其子为安南国王，撤销交趾三司，允许交趾恢复独立。廉州与交趾的贸易，商业来往恢复为海外贸易。宣

德五年（1430年）至成化元年（1465年），交趾频频遣使取海道经廉州，由广东向明王朝进贡。廉州既是交趾进贡之所，又是与交趾经济文化交流之地。当时，进口的外国货物主要为沉香、胡椒、荔枝、钻石、象牙、犀角等。而由廉州输出的，则以陶瓷、铁器、纸和丝织品为大宗。总之，明朝“廉州增驿”的措施，大大促进了廉州“海上丝绸之路”和对外贸易的发展。

二、廉州大规模漕盐和采珠活动客观上促进海上交通和贸易的发展

明初，明统治者采取缓和阶级矛盾的措施，注意发展农业生产，在边远地区大兴屯田。其中商屯是盐商在此募人屯垦，就地交粮，向政府换“盐引”，领盐贩运。朱元璋十分重视“煮海之利”，并把其作为财赋的一项重要来源，诏令：“置局设官，令商人贩运，二十取一，以资军饷。”洪武二年（1369年），明朝在廉州设海北盐课提举司，管辖今广西北部湾沿海的漕盐业务。海北盐课提举司，属于明朝七个盐举司之一。因而，明代廉州漕盐比宋元时期的规模更大。1398年，明朝在廉州“定运盐例”。当时，海北盐课提举司管辖廉州盐场15处，其范围主要在今北海市沿海的永安、白沙、石头埠、揽子根、武刀港、大冠沙、西场一带，盐仓仍设在今合浦县石康。海北盐举司以南流江这条水道为干线，由南向北调运海盐。漕船从石康沿南流江而下入海，至永安，“则历乾体、高德港、冠头岭、龙潭、武刀、白沙、珠场、陇树、禄树等寨”。今北海市沿岸海滩大部分都是廉州主要产盐之地，从这里从海上调运往石康集中，铁山港、北海港一带海域便成为明代漕盐的主要集散港口。

海北盐课提举司旧署原设在合浦县石康，后改设在廉州镇，以利于管理。据《合浦县志》记载，廉州沿海港汊晒盐条件甚为优越，先做好盐田，然后几次引入海水，沉积之后，即得卤水，后经风化得盐。经营漕盐，使当地官府获利甚大，仅在白沙一带盐场，便可以“课额岁银二千一百余两”。另外，海北盐课提举司每年上缴给明朝廷，“岁入大仓课银一万余两”。廉州漕盐获利之厚，可见一斑。海北课盐提举司虽然设在廉州镇，但是经营供应漕盐的范围很广。据《明史》卷八十记载，廉州盐行销广东雷州、高州、廉州、琼州四府，湖广的桂阳、郴州，广西的桂林、柳州、梧州、浔州（今桂平、平南县）、庆远、南宁、平乐、头平（今崇左等地）、思明（今田阳、田东县）、龙州（今龙州、宁明，即凭祥市）、泗城（今田林、凌云、凤山县）、奉议（今百色、巴马）、养利（今凌乐）等州县。廉州沿海产的食盐，由漕船溯南流江北上，经西江、桂江销往广西全境和湖南南部，南流江这条航线在宋、元、明三代漕盐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合浦县明代漕盐的规模更胜于前代，由商人专造漕船，“专运熟盐，不装别货”。各盐场的漕盐要集中运抵石康盐仓贮存，再运抵玉林、梧州销往各地。石康盐仓位于南流江下游，高、雷、廉、琼四府沿海生产的食盐销往广西，大都要经廉州，后来，明朝廷裁撤设在廉州镇的海北盐课提举司，“归并廉州府海防同知兼理卖盐”。廉州府海防同知是专门管理港口和兼理商舶来往的官员，明朝将海北盐课提举司的职权，归海防同知兼办，并且在冠头岭等处屯兵增卫，设盐哨，大大加强了对廉州漕盐的安全管理。在明王朝统治期间，今北海港、铁山港一带，成为广东、广西漕盐的重要港口。

珍珠是合浦著名产品，是交流的重要商品。明朝廉州珍珠产业十分兴旺。明代饶秉鉴《南浦生珠》诗云：“南浦茫茫接海洋，明珠海底久珍藏。贝宫漫说生明月，蛟室宁知有夜光。瑞采晓胜波潋潋，蚌胎时吐水苍苍。也知至宝难长晦，万斗于今拥帝傍。”从明朝廉州府太守饶秉鉴和文人对合浦采珠兴旺的描绘，反映出廉州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商品是珍珠。合浦珍珠，又名南珠，

自古闻名中外。合浦沿海居民“赖以采珠为活”，开掘了七个天然珠池。其位置即大约在今合浦县沙田、铁山港区南面海中和北海港区域内的大冠沙至冠头岭一带。从汉代至明代，合浦珍珠业长盛不衰。汉时，合浦人“以珠易米”，一因产珠之多，二因穷人不甚注重穿戴。然而，唐宋以后，廉州成为海疆一大都会，声明文物“媲美中朝”。至明代，更成为“海北雄藩”。当时，“富者以珠多为荣，贫者以无珠为耻，至有金子不如珠子之语”。合浦珍珠不仅畅销廉州邻郡，而且远销中原和江南一带。正如《合浦县志》记载：“产珠之池一隅，而珍珠用极于东南。”从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至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的两百余年，明皇帝的采珠规模更大，这对廉州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发展起着较大的促进作用。据《合浦县志·事纪》记载，从1396年至1613年，明皇帝共18次下达关于合浦采珠的诏书。据两广总督林富在向朝廷上奏的《乞罢珠疏》中记载，明朝征调民夫船只采珠，以弘治十二年（1499年）的规模最大。广东布政司受钦命，大量征集广东沿海民间大艚船，全部汇集在廉州沿海港口。其中，东莞县（今东莞市）取大艚船200只，琼州取大艚船200只，每只用夫20名，共8000名。雷州府、廉州府各出小艚船100只，每只用夫10名，共2000名。于是，合浦沿海汇集了600艘艚船，民夫10000名，规模可谓浩大。为了解决一万余名船夫的伙食，广东布政使“先提解银二万两，汇发沿海雷廉二府”。此次共“获珠二万八千两”。随着明朝大规模的采珠活动，不少商贾纷纷抵此贸易，使廉州对外经济文化大为兴旺，亦使合浦与潮、穗、琼、雷等广东沿海商埠的海上交通和人文来往更加频繁。

然而，明王朝在采珠生产活动中不讲求经济效益和生态平衡，给当地经济造成恶果。嘉靖五年（1526年），因滥采珍珠而大大破坏了港口海水养殖的生态平衡，所以虽然出动数百艘船，近万名民夫，却收获甚少。嘉靖八年（1529年），明世宗又下诏命廉州采珠，据官府统计，当年采珠，造成军壮船夫病死300余人，溺死280余人。风浪打坏大小船只76艘，漂流无人空船30艘。沉重的珠役，使廉州沿海的珠民们付出巨大代价。给事职官王希文上疏指出：“雷廉珠池，祖宗设官监守，不过防民争夺。正德间，逆竖用事，供奉采取，流毒海滨。陛下御极，革珠池太监，未久旋复。驱无辜人民，蹈不测之险，以求不可必得之物。而责以难民之数，非圣政所宜有。”王希文疏，虽然指出大规模滥采珠的流弊和严重恶果，但明朝皇帝却一意孤行，下诏命廉州继续采珠。明英宗派太监亲临合浦监督采珠，在白龙港用大量的珍珠贝筑珍珠城，城内设有还珠公馆、珠场巡检署及盐场大使衙门和宁海寺等建筑。正德年间，明武宗又派太监奉旨抵港口监守珠池。据《明史》卷八十二记载：“守池太监一年所费不少千金，十年动以万计，动以万金守一珠池。”隆庆六年（1572年），明穆宗亲自下诏，命令“广东采珠八千两”，上贡朝廷。于是，广州布政司再从潮州、惠州、广州、雷州、琼州抽调大批船只抵合浦沿海一带采珠。

至明代中后期，明初僵滞的文化格局发生变化。社会风尚演变中“导奢导淫”，扮演者是明朝的统治集团。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明神宗又遣派“御马监李敬开采珠池”。太监李敬征调大批艚船、渔船、商船采珠，获得珍珠5100余两。事隔两年，明神宗又派中官太监李凤抵廉州采珠。据《合浦县志》记载，李凤抵港后，划海为界，“践海为池”，“调民船四百有奇”，以及商船百艘，“供役千人”，并且还派“押舶守港兵二千六百，支粮四千余石，旗仗什物咸备”。共花费白银22400两，但所获珍珠却不满百两，真是得不偿失！正如明朝合浦顾梦生的诗歌《珠池叹》所云：“往时中官（指太监）莅合浦，巧征横索如豺虎。中官肆虐去复来，谁诉边荒无限苦。”另外一首明朝林

兆珂的诗歌《采珠行》亦记载：“哀哀呼天天不闻，十万壮丁半生死，死者长葬鱼腹间，生者无语摧心肝。”从中反映出这些太监的贪暴，害得民不聊生。这场采珠活动，历时五年，至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始停采。廉州人民刚喘一口气，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明神宗为了再次满足宫廷的需要，听信宦官奸臣意见，又下诏采珠，继续征集船只抵港口采珠。

明朝廷在廉州漕盐和先后 18 次大规模的采珠，随着漕盐和采珠产业的发展，客观上促进了廉州南珠文化的发展，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和对外经济文化的交流兴旺。

三、明朝地方官府注重发展港口，冠头岭海域成为廉州主要门户

明代廉州府合浦县沿海港口主要有英罗港、永安港、白龙港、南湾（今北海港区域）、冠头岭内（今北海港区域）、乾体、大观港等，其中永安港左傍英罗港，右依铁山港，扼高、廉、琼海道的咽喉，明初为合浦东部海防要冲。大观港位于合浦西部，是钦廉通航要道。乾体一带处于南流江入海口，是合浦的主要门户。这些港口常有军队驻守，防范倭寇、海盗入侵。明代的冠头岭海域（即今北海港水域），位于南流江出海口之南，由北湾（东起赤壁岭底，西至地角、冠头岭，北接乾体港，南抵外沙和今市区海堤）、冠头岭内（即今外沙内港、地角避风塘、红坎村一带）和南湾（东至西村港，西至冠头岭，北起大墩海一带，南至大海中）组成。据最早的地方志《广东通志》（嘉靖）记载，明代冠头岭岭南北海域，已成为广东船舶主要寄碇之所。北湾的南岸，即今北海市的市区，在明朝嘉靖前早已有人居住。其中，北海村位于今外沙内港南侧。军屯、独江、旧场等村，约建于宋朝开宝五年（972年）。南万村位于冠头岭西南角，又称“南万角”。地角村，约建于明朝成化十六年（1480年）。该处最早的居民，是明朝从广东迁来的何姓人家，“随之有不断迁徙来者”（以从合浦县乾体迁来的客家为多）。据史载，位于北湾海域中的“地角网埠”（俗称“网门”，即今北海港装卸锚地），主要是乾体人在此营生。早期地角村的兴旺和繁荣，是乾体先人艰苦努力开拓的结果。由上可见，在明朝嘉靖（1522年）以前，今北海市区口岸已逐渐形成。

嘉靖年间，因航海技术的发展，抵港船舶吨位增大，加上南流江出海行道的淤塞，大海船进出廉州十分困难。港口主要位置由乾体向水深的南面变迁，今北海港一带逐渐兴起。早在洪武年间，廉州官府便在合浦县沿海设川江寨（今婆围）、调埠寨（今营盘）、陇江寨（今牛屎港）、珠场寨（今白龙）、白沙寨（今竹林）、武刀寨（今西村）、龙潭（今市郊的龙潭村）、古里寨（今市区至南万港东侧一带）作屯戍防守之处。古里寨，是北海市区（包括高德、地角）的古名，因其时有古里村而得名。北海市区最早的港埠，一在今南万港（古称“冠头岭内”）附近，一在今装卸锚地（古称“北湾”），一在高德港。据《广东通志》（嘉靖）卷六十六记载，明朝中叶以前，高德、冠头岭、北湾已形成港埠。洪武八年（1375年）明朝巡检郭成驻军冠头岭，建“廉阳古洞”（王龙岩）和镇海庙。古洞门楹联为“王恩周海角，龙气起冠头”，往昔香火极盛，村民祈禳，春秋不绝。反映出 600 年前，冠头岭海域已是廉州“海上丝绸之路”和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之地。随着“海上丝绸之路”和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明朝一度允许广东沿海商埠对外互市。随着廉州对外经济文化交流规模的扩大，港口海上交通逐渐发展。此时，航海技术比前代大为提高，抵港船舶吨位逐渐增大，但南流江入海口处泥沙的淤积壅塞，使大海船由海港溯南流江抵廉州镇街圩碇泊已十分困难。为此，廉州府曾两次出动数以万计的民夫，疏浚航道，但仍无济于事。据载，正德年间（1506—1521年），南流江下游屡疏屡淤。嘉靖时在下流修筑堤坝，终因入海处航道淤浅严重，

吨位大的海船只好停碇在高德、地角和冠头岭一带，并改由渡船和槽船维持乾体至廉州等处的内河运输。于是，港口主要位置逐渐向水深的南面伸延，今北海市区逐渐兴旺。此时，中国航海已将导航仪器罗盘、计程时更、海图与牵星图综合运用，可以保证船舶安全准确抵达目的港。明朝的大海船已在冠头岭下发舟，开辟往安南海东府、海阳府、太平府、新兴府的不定期直达航线。由港口向东出发，“日半至雷州，三日至琼州，正北十日至广州”。向南出发，可直达交趾永安洲。“舟漂七八昼夜至交趾青州府界，如舟不能挽，经南则入占城”。由此可见廉州大力发展“海上丝绸之路”和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建立海上航线，定期东达粤、闽、浙沿海各埠，南抵东南亚各国港口。

今北海港由冠头岭跃出海面，屈曲回环而抱成良港。港区水域北面包括廉州湾大部分水域，港区南面水域东至福城镇的西村港，西、南在冠头岭外大海中。廉州湾内的北湾（今装卸锚地、地角网门），冠头岭内（包括外沙内港）等古港都属北海港水域。据《广东通志》（嘉靖）卷六十七详细记载：“广东海道自廉州冠头岭发舟，北风利，二三日可抵安南海东府，若沿海岸西行，一天可抵钦州乌雷岭，第二天可抵白龙尾，第三天可抵玉山门，第五天抵万宁州。”接着可“南至安阳海口，又南至多渔海口。各有支港以入交州。自白藤江而入……则经安阳县至海阳府。溯洪江至快州，经咸子关口，由富良江（红河）以入……此海道之大略也”。这是有关北海市所辖冠头岭至交趾航路的重要史载，说明冠头岭一带海域在明代已成为廉州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港口。

冠头岭地处今广西海岸线的中端，是明代广西北部湾航海的一个重要标志。正如《廉州府志·地理志·山川》（崇祯版）记载：“冠头岭脉自大廉来……跃出大海二十里。当郡城之坤维，若郡外之外郭。”可见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当时，“安南、暹罗、满刺加，诸番风帆易达廉州之境”，“自廉之冠头岭而东至白龙、调埠、川江、永安……”，“自冠头岭而西至防城……水道皆通”。明朝《廉州府志》（嘉靖）卷六称：“冠头岭俯视六池，为廉门户。”“池”是指“珠池”，亦指明代在冠头岭山顶可以观望合浦沿海的六个珠池。明朝顾禹祖《读史方輿纪要》载：“珠母池东南八十里海中，有七珠池。”“西为平江、杨梅、青鸾三池，有大蚌，剖而有珠。今止以三池所谓合浦珠也。”合浦珠池的分布海域，见诸历代志书的图经，大致可以确定为今广西沿海，即东起雷州，西至东兴的广西北部湾海域。其中，应以平江、杨梅、青鸾珠池为主。由此形成的珍珠捕捞产业圈，也是廉州府海洋经济的腹地。明朝在冠头岭一带海域大规模采珠，客观上也促进了廉州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发展。据1986年12月《考古》杂志刊载的《广西合浦上窑窑址发掘简报》一文报道，当时上窑、下窑等窑址，在明朝之所以兴旺，是“与合浦县白龙采珠场有着密切的联系”。明代，“上窑、下窑等窑址也有十余处，窑炉数十座，每年生产至少也有几十万件瓷器”。当时合浦居民是用不了那么多的陶瓷的，大部分产品应是出口贸易。另外，岭底缸瓦窑，位于今市区北面的靖海镇岭底村委会北约1公里，沿着海岸边“有三条龙窑的遗迹”。“明朝时，北海地区刨烧窑加上前代延烧的瓷已有十多条，以每条窑每次装烧器物2万件计，每年就烧造40万件”。明永乐年间，合浦人口为33007人，如此多的陶器产品，不可能靠当地消费。凭着港口和海运优势，显然是廉州出口外贸，寻求生存和发展空间。另外，今北海市海城区岭底缸瓦窑大量出土烧制的梵文青花碗，有着与佛教文化、信仰相维系的梵文纹饰。从而说明，廉州地区生产的陶瓷文化产品，主要由港口销往泰国、柬埔寨，以及印度等佛教盛行的地区。

四、明王朝后期统治者丧失海权意识，实行“海禁”，造成廉州对外经济文化交流衰落

明朝后期是中国经济文化史发展的一个关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粤闽商人“非数十万不称富”，他们全力发展商品经济，为自然经济松解，产生资本主义的萌芽，为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和对外贸易提供了社会氛围。明代饶秉监《西门古渡》诗云：“郡城西出是通津，津渡开来不记春。短棹尚随迎送急，扁舟宁厌往来频。”诗中对廉州水上运输的描写，反映出廉州水上交通的繁荣。明朝时，随着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繁荣，廉州一度成为中国对外贸易主要港口。据《广东通志》（嘉靖）记载，我国广东商船已由今北海港一带扬帆出海，不定期抵东南亚各国港口，从事海外贸易。嘉靖年间，广东巡抚林富上奏朝廷，力陈对外通商，有“助国、给军、利官、利民”四大好处，实施有限的“开禁”。因而，冠头岭一带海域已逐渐繁荣，成为合浦主要门户。彼时中华民族的海洋经济十分强大，无可匹敌，足以让炎黄旗帜飘扬到世界的每个角落。而且，西方此时还刚从梦中醒来，并不强大。然而，嘉靖后期，统治者认为只有“厚本抑末”、重农轻商和海禁，方可保封建王朝长治久安，下令“严禁交通外番”，“毋得擅自出海与外国互市”。这种政策，使中国封建主义社会渐趋僵化和没落。与此相反，当时西欧一部分国家进入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纷纷向东扩张，进行海外掠夺，首先破坏了中国传统的“朝贡贸易”制度。外国殖民主义者飘忽于中国南海拦船劫货，干着赤裸裸的海盗罪恶勾当。日本武士、浪人勾结国内的“强盗”，骚扰我国沿海口岸。廉州地区作为北部湾的主要贸易集散地，自然成为这些倭寇洗劫的目标。与此同时，葡萄牙海盗在广东沿海活动十分猖獗，他们到处杀人放火，拦路抢劫，焚毁村庄。其中，天顺三年（1459年），安南海寇冒充商贾，从海道抵廉州进行贸易，并与内地“蕃民”勾结，伺机在北海港及附近海面抢劫商船的货物及渔民的珍珠，杀害百姓，严重地影响了廉州沿海生产和社会安定。于是，朝廷下诏廉州府，“诏禁钦廉商贩无得与安南夷人交通”。因而，与安南的经济文化交流一度中断。

嘉靖以前，廉州已有相当规模的陶瓷作坊，生产了大批的陶瓷器，大都向东南亚各国出口。然而，廉州府一度采取招民开垦以减田赋的办法，将农民禁锢在农业之中，约束海洋经济的发展，并且严禁商船出海。明朝后期，廉州沿海港口已无永乐、宣德时番舶云集的气象了。廉州商贾有时仍以贩卖鱼盐为名，冒禁进行海外贸易。弘治十六年（1503年），为了加强廉州海禁，明朝把海北道兼兵备道移镇廉州，造成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十分萧条。据《明史·满刺加传》记载：明朝为了保护广东沿海水域，对外番“行令驱逐出境，并且再申洋禁。自是安南满刺加诸番，有司尽行阻绝”。正是由于明朝水军在广东沿海加强海禁，所以安南、满刺加、暹罗等国商贾不能再在廉州等埠互市。结果，他们“皆往福建漳州海面地方，私自行商。于是利归于闽，而广之市井皆萧然也”。明朝中期以后，由于倭寇和安南海盗的骚扰，统治者惧怕“海疆不靖”，再次令廉州府“申洋禁”。这种闭关自守的海禁，使当地与东南亚各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一度中断。一刀切的政令，试图以牺牲沿海的民生为代价。1509年，海盗再次侵犯中国沿海地区。为保卫海疆，明朝“再申洋禁”。正德十一年（1516年），海寇又侵犯廉州沿海，“入寇西场”，立即遭到乾体营水师的伏击，海疆暂时获得安定。但明朝仍禁止与外番贸易，并封闭所有通商口岸。于是，廉州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亦暂时告停顿。这种闭关锁国政策，放在世界历史潮流中考察，无疑是一种落伍行为。

明中叶以来，西方殖民主义者相继向东方扩张，进逼中国本土，并屡屡骚扰我中国南方沿海。

面对殖民主义侵略的威胁，面对西方文化技术已领先的现实，明统治者不是着眼于励精图治、锐意革新，而是实行严厉的“海禁”。然而，海禁并没有能断绝海上贸易，只是将它们逼入了“地下”而已。“海禁”以后，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因不准外销，一下子全球供货紧张。但是，海外市场对它的强劲需求依然存在，因此，迫使中国商品“走私”成为一个暴利行业，也加剧了传统的海盗活动。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至崇祯九年（1636年），海寇大规模在今铁山港和北海港一带抢劫商船11次，并洗劫沿海村庄，使廉州贸易遭到大破坏。涠洲岛在冠头岭海域南面，素为港口天然屏障，一度沦为寇穴。他们以此为据点，骚扰港口，使廉州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大受影响。明朝为了保证廉州海上的安全，派水师在古里寨（今北海市区）和龙潭寨古城（今属北海市银海区）大败倭寇。《粤海杂录》称“龙潭古城抗倭至要，且港湾曲折、隐蔽，又易补给”。可见，今北海市银海区在明代曾为抗倭要地。万历六年（1578年）以后，明朝派水师驱逐涠洲岛的海寇，并移民耕地，派游击一员镇守。另外，在冠头岭设巡检增兵屯戍，还在乾体驻水师，增置战舰。这些军事措施，对保卫廉州海上安全起了一定的作用。

明末虽然实行海禁，但廉州曾一度对交趾、占城等国开放贸易。当时，明朝以为交趾、占城等东南亚各国，“皆我羁縻外臣”，允许来往通商，唯“特严禁贩倭奴者”。除了对日本禁止通商外，与其他国家均来往未断。抵廉州的外国商人，亦主动向沿海巡检司报税。由于抵港商船甚多，地方官员打主意，订立一种税则，叫“水抽”或“船头规”，因按照船梁头的尺寸长短向船主征税，所以又叫“丈抽”。例如，番舶船阔一丈七尺，“每尺扣税银为五两五钱”。而对本国商船征税较轻，梁头不及五尺，“照例科征正耗银三钱六分”。这种“丈抽”方法，廉州府从明朝万历年起一直沿用到清朝乾隆时期。其主要原因是“夷人报货多奸欺，查验困难，故改为丈抽”，以保证官府的财税收入。后来，因廉州与安南占城等诸番接近，来往船只日趋增多，市舶司一职变成肥缺。明皇帝为控制此地，派亲信太监抵廉州，在此设市舶司太监和珠场太监、差役、护兵共80名。据《合浦县志》记载，市舶司的职责，管“海外诸番朝贡、市易之事”。当宦官掌握港口市舶大权之后，他们便凌驾于廉州府太守之上，到处胡作非为，对外番商人任意敲诈勒索，“迨番舶船既至，则多方以攘其，提举衙门不敢过问”。嘉靖九年（1530年），广东巡抚林富上疏“乞革珠池、市舶内宦”。1532年，“市舶守珠池内臣皆革之，一时称快”。然而，到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又恢复市舶太监制度。由于赋税苛重，外国商人不愿抵此，廉州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大受影响，外番船只抵港口骤减。

明朝后期统治者腐败无能，贪污成风，民心丧尽，造成当地经济衰退。万历年间，明神宗追求奢侈享受，大修宫殿，造成“国用大匮”，出现财政危机。为此，明统治者除派太监抵港口收采珍珠外，还任命太监在廉州兼任市舶使，四出课敛诛求，勒索商民。当时湘江、桂江、北流河、南流江这条中原出北部湾旁通东南亚的交通大道，沿线都设有关卡、税使，对船舶进行抽税，税率很高。据《明纪》卷四十四记载，太监沈永寿在广西胡作非为，搜刮民财，“凡店租、市舶、珠榷、木税、船税、盐、茶、鱼、苇及门摊商税，油布杂税，无不领于中使”，“米、盐、鸡、豕，皆要征税”。贪官不仅对市舶苛收敛取，而且派出差役横行四方市井，“视商贾懦弱，肆为攘夺，收取资金”。贪官敲诈勒索，必然摧残商埠及内地的商业。因而，繁重的赋税，太监吏胥的苛索，直接激发了阶级矛盾。当地人民因“苦于征敛”，纷纷离乡背井。据《北流县志·宦绩编》记载，

明末，北流、容县一带，“民多流徙”，“十室九空”。万历十九年（1591年），广西的税官又在南流江、北流河这条航线加重捐税，以致“木盐鸡犬，皆令输税”。加上明朝太监插手，官商勾结，与民争利，造成“民之贾日穷，官之贾日富”，民变屡兴，政局动荡。结果，“苍、藤、博、北四县民大噪”，“民不胜忿，遂激变”，揭起反抗的大旗，明朝统治者慌忙调兵镇压，促使社会更加动荡，生产遭到更大的破坏，廉州港口腹地经济萎缩，对外贸易呈现衰落。另外，廉州设“海北盐课提举司”，调集当地出产的食盐，经石康、玉林销往广西全境和湖南部分地区。但运盐船夫，全以差役充当，“就役如赴汤镬”。差役当船夫，他们不大懂水手业务，认为是苦差，纷纷逃离，不少官办船只无人驾驶，严重影响廉州沿海漕盐运输。

明朝后期统治者腐败无能，致使国势衰落，西方殖民主义者和倭寇趁机加紧侵扰两广沿海地区。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安南海寇乘小艇百艘，由龙门攻入钦州，“放火大剽而去”。崇祯九年（1636年），安南海寇又在合浦沿海港口劫杀商贩。廉州府虽加强海防，但却因为兵力不足，难以防范。此后，明王朝再次下诏廉州府“涉海商贩不许潜与安南夷人交通”，并宣布“禁通番”。这种闭关政策，妨碍了廉州“海上丝绸之路”和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正常发展，廉州经济文化此时失去了自宋代以来持续发展的大好势头。天启至崇祯年间（1621-1644年），明朝先后经历宦官乱政和李闯的农民起义，继之清兵入关，明王朝便走向灭亡。

（作者系北海港培训中心原主任、高级讲师，北海中华文化促进会常务理事、文史研究部部长）